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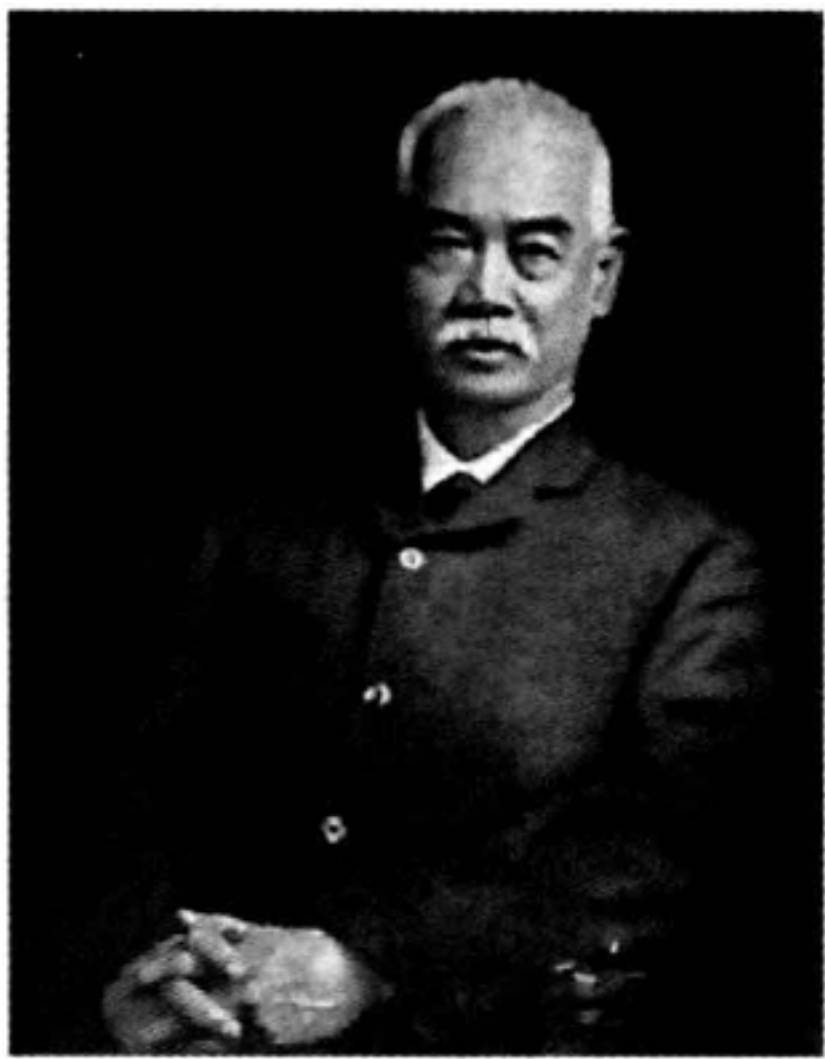
苦块剩餘生，九原无伴应招我；
斗山今失望，四海何人不哭公。

他还在自己的揭阳居所园内特意建造了曾文公祠，以作纪念。



“近代留学第一人”容闳

容闳，近代中国第一位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并获得学位的留学生，自幼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。学成回国后，他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之路，是一位思想新锐、以新派形象示人的维新知识分子。在广大士人心目中，曾国藩是以“内圣外王”的典范形象领袖群伦的传统文化殿军。但就是这样两个在教育背景、思想倾向和整体形象上大相径庭的人物，却在洋务新政的政治舞台上，携手共演了一部历史大剧。



容闳

1861年9月，湘军打败了太平天国的军队，攻克安徽省城安庆，随后曾国藩将行营迁驻安庆。次年，他创建了安庆内军械所。曾国藩虽召集了像李善兰、华蘅芳、徐寿等一批科技人才，也制造了中国的第一艘蒸汽小轮船，还与他人合作制造过枪炮子弹，但这些与曾国藩自强新政

的希冀差得太远。在曾国藩十分焦急的情况下，他的近身幕僚张世贵（浙江宁波人）便推荐了容闳。

被尊称为中国近代留学生之父的容闳博士曾有过三次“报效”，他在《西学东渐记》里未提一笔，亦鲜为人知。其中一次是在1865年，报效的对象正是曾国藩。

此时，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抱着“以西方之学术，灌输于中国，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”的“野心”准备回国大干一场，没想到回来后的行情却不尽如人意，走到哪里都得不到别人的认可，这点令他非常苦恼。

这个时候他得到两江总督曾国藩的邀请，让他去安庆。接信后的容闳既惊又疑。在接到曾国藩的第二封邀请函尤其是夹带在其中的李善兰的书信后，容闳立即回信一封，答应数个月后一定会来安庆。1863年7月，容闳又收到张世贵的第三封信和李善兰的第二封信，仍是催他速来安庆，并明确转告曾国藩希望容闳“居其属下任事”。容闳回信：“决计应召来安庆……最迟8月可启程。”

1863年容闳成为曾国藩的幕僚，“中国近代之父”和“中国留学之父”开启了中国近代的新纪元。1863年10月曾国藩指派容闳为“出洋委员”，授予容闳五品军功，赏戴花翎，携款银6万8千两出洋采购机器。1865年机器运抵上海，这批机器与丁日昌花了6万两银子买下的虹口旗记铁厂合二为一，创办了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江南制造局。坐镇徐州剿捻的曾国藩知道，容闳回国后必循官场陈例大出血一番以“报效”自己。

1865年，容闳的“报效”曾国藩，实出于一份千里马对伯乐的感遇之恩。欧洲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，洪杨之乱荼毒生民，而在这个时候建议曾国藩购买洋枪洋炮，也的确是找对了人。曾国藩在朝廷

拥有相当的说话权，买回来这些东西既能剿内乱，又能防外患。

在容闳看来，曾国藩一生政绩、人格皆迈群论，犹如珠穆朗玛峰高耸于喜马拉雅群峰之巅，令人望而生畏。正如他说的那样，即使曾国藩自己不能亲眼看到时局后来的变化，但中国教育因为他的努力和帮助产生的变化却是永远的。那些学生们能够受到文明教育，都应该对曾国藩怀有感激之心，也绝对不可忘记他的恩德。

容闳打心底里就对“报效”之事不耻，送的人不干净，收的人也污了名。曾国藩是容闳最为景仰的中国人。在后者眼中，前者“作为一位政治家和爱国者，他的人品远远超过他的同僚”，其伟大“在于他的伟大品德——纯真而不自私的爱国主义精神，具有深思远虑的政治头脑和为官清正”。曾国藩在容闳心里有着如此崇高的地位，怎会愿意用“报效”玷污了恩人的名声呢？若是没有曾国藩的赏识，说不定容闳到死也不过只是个空有一身傲骨的市井小民，曾国藩不但招他为幕僚，还多次采纳他的意见，知遇之恩，无以为报。容闳是个正直人，有恩不报，心里自然是会过意不去。但曾国藩所做的，一没徇私，二未枉法，一切都是秉公而行，哪来“报效”的必要呢？

不过，容闳“报效”曾国藩的究竟是银两还是器物？由曾国藩嘱咐儿子话来看，他“报效”的不是黄金白银，而是西洋的“奇巧淫技”，企望借助这些西洋发明拓展一代名臣的视野，轰然一声打开清王朝紧闭的铁门。

从这件事上，可以看出曾国藩为人为官之道，既让容闳心里好过，了却“报恩”之愿，又不希望“报效”之事损了大家的清名，二十金之限，就是为了在报恩和报效之间，找到分界线。